

# 陆定一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文显

(四川师范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陆定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曾经对建立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作出过重要贡献; 但建国后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产生了“左”的错误, 从而对长达20多年的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曲折,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他又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对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关键词:** 陆定一; 中国共产党; 知识分子政策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1)04-0017-10

陆定一从1945年起, 在中共中央当了21年的宣传部长, 一直到“文革”初期被罢官为止, 因而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问题笔者在《知识分子问题: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1]一书中已有论及, 但总觉得意犹未尽, 现补叙于下。

陆定一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对建立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作出过重要贡献。

陆定一是一位早在1925年就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 又是交通大学的毕业生, 在党内算得上一个大知识分子。但是, 在笔者能够看到的他的早期论著中, 却没有涉及知识分子问题, 甚至连“知识分子”这个词也没有出现过。陆定一开始接触这个问题, 是在中共中央1939年12月作出

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sup>①</sup>这个历史性的决定之后。

1941年4月, 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指示》。陆定一当时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主任。为了正确地贯彻这个指示, 他起草了《大量吸收和正确对待专门家》[2](292页)。在这个长达6000多字的文件中, 陆定一对什么叫专门家, 怎样识别真假两种人才, 以及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并保证其生活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政策, 都作了深入的论述和明确的规定。

“专门家”同“文化人”一样, 都是延安时期对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称呼, 前者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人员, 后者主要是指文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陆定一认为, 我们在当时需要两种专门家: 一种是有关军事方面的, 如步骑炮工辎人才、坦克飞机人才、通讯人才、医务人才、供给管理人才、军事理论人才等; 另一种是与旧社会中各种武装

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人才亦即军事统战人才。至于为什么需要这些专门家,陆定一从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军事艺术必须是先进的艺术,它常常依靠于科学与技术的最后成就。因而“吸收大批的科学技术专家,到我军的各个部门中来,乃是我军现在的急需,而对于将来的建军工作,更是‘百年大计’”[2](293页)。也就是说,战争的胜负不但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也是科学技术的较量,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更是这样。陆定一的这个观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恩格斯早就作出了“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3](206页)的论断。在当时,我们批判了作为“亡国论”的论点之一的“唯武器论”,但决不能理解为只用大刀长矛就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坦克大炮,日本也不会投降<sup>②</sup>。

陆定一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说明我们过去之所以成就了伟大的军事事业,绝对不是由于没有军事专家,而恰恰相反,是由于我们有了军事专家。他说:“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更为重大了。没有大批的专门家,不把我们的军队与现代的科学技术与军事知识结合起来,就无法完成任务了。”[2](294页)陆定一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国防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在中共党内当时能够这样明确地提出问题的人还没有第二个。在此基础上,陆定一响亮地提出了“尊重科学,尊重专家”的口号。

陆定一还认为,专门家有真假之分,而领导者的任务,就在于将他们正确地区分开来,不但要善于对待和团结各种各样的真的专门家,而且要善于勘破各种假的“专门家”。至于如何正确识别真的专门家,陆定一指出:“他们真正有自己的专长,品行是端正的,但政治觉悟则不是一律的。”他们“可以是共产党员,可以是非党员而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可以是不问政治而有正义感的,可以是只想在自己所专长的科学事业本身中有所建树的,可以是只想‘靠本事吃饭’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千差万别,在生活习惯上也千差万别,但都是有真学问真本领,而愿意贡献自己特长的人”[2](297

页)。这就告诉我们,识别真假专门家的关键是看他有没有真正的学问和本领,而不应着眼于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生活习惯。陆定一的这些话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领导者总是想用战士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当他们看到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真正有本领的人)“思想落后”,“生活散漫”,就会本能地产生反感,甚至会排斥和打击他们。

对于这些真正的专门家特别是其中的非党员,陆定一也认为在政治生活上不应作过高的要求,即“他有自己参加我军政治生活与政治学习之权,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政治课、政治集会、政治测验等。填写履历表只写学历与工作历史,不写政治历史”。“当他们要求入党的时候,则乐于吸收他们入党”[2](299页)。这是一段政策性极强的话。非党专家只是专家,他们既不是干部,更不是党员,因而对他们在政治上作过高的要求,显然是不适当的。至于他们中有些人由于工作的需要或个人的志愿而当干部,做党员,那是另外的问题。

为了能够让这些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陆定一认为一是要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二是要保证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对于前者,陆定一认为:“对于科学技术专家,应当以其学识和能力为标准,而不是以政治觉悟的程度为标准,给以适当负责的科学技术工作,给以对于他所主持的工作部门充分的权力和充分的信任。应该知道,在专门家的真假问题解决之后,在专门学问和专门技术的领域中,是只有学识能力高下之分,没有‘政治’、‘资格’、‘地位’、‘出身’之别。”[2](298页)对于后者,陆定一认为对于各种专门家,“一律在物质上给以良好的待遇。要在平时战时,保护其本人及家属的安全”。“对于科学技术专家,还需尽量为他购买科学仪器和书籍,及供给应用物品,以保障其工作的条件”[2](299页),而不能讲平均主义,更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比上述中央军委的《指示》,陆定一显然是把政策讲得更为具体、更为实在了。

以上,笔者比较详细地评介了陆定一起草的这个文件,这是因为它写得实在太好了!好就好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切实具体,而不是叫人摸不着边际的空话或官样文章。它同几个月

前张闻天起草的那份《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一起,可称为正确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双璧”。时隔半个多世纪,不但历史已经证明它们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原则都是正确的,而且直到现在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不久之后便开展了整风和审干,特别是康生大搞“抢救运动”,以致于这些文件中规定的许多政策并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执行。

此外,陆定一还就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问题和“知识分子实际化”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限于篇幅,这里就从略了。

建国以后,陆定一继续为建立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贡献,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出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双百”方针既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又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大发展。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于学习苏联和今后宣传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正确地贯彻这个方针亦即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和界限。

第一,要划清敌我界限。当时,正处于经历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sup>③</sup>和由此引发的“肃反”这场政治风暴之后。“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由学术批判开始的。因此,大家一听到学术批判就心有余悸,生怕会给自己搞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戴起。针对这种情况,陆定一一再强调“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必须把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严格地区别开来”[2](503页)。并且认为,“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甚至“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2](501、503页)。陆定一提出的这“六个自由”,应该说是真正地实行“双百”方针的前提条件。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了学术自由,还到哪里去找“百家”呢?

陆定一还认为:“对文艺、科学中的问题,是政

治问题、思想问题还是纯粹学术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混淆起来。要一个一个地具体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切不要乱戴帽子。”[2](526页)就是那些真正在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也“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2](506页)。

第二,反对贴“阶级标签”。陆定一认为,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给它们“贴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2](510页)。在学术问题上不贴“阶级标签”,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一旦给某人的学术理论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那就等于宣布了他在学术上的死刑。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陆定一认为,有一些党员企图垄断学术研究工作,把党外专家“看作永远只能是个唯心主义者或资产阶级学者”,则不但会导致这些学科领域的死气沉沉,停滞不前,就是个人也有堕落的危险。

第三,反对行政干预和简单粗暴。建国初期学术界开展的两次学术批判即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有“行政干预”(领导者发动)和简单粗暴的问题,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胡乔木和胡绳分别在有关会议上公开讲清楚了<sup>④</sup>。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陆定一发觉得较早,他在批评斯大林的文艺政策时说:“苏联常常说文艺落后于现实,但总是跟不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方针不对头,党对文艺的干涉太多了。”[2](523页)陆定一认为,在实行“双百”方针时,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教条主义者“对待这一类问题,只想一棍子打下去,或者来个民主,围剿。关于这种思想,我们应该看看匈牙利的格罗。犯了那么多错误,群众上街游行,本来这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是他要去压,结果变成对抗性的了”[2](556页)。这里是用“匈牙利事件”<sup>⑤</sup>的经验教训,来说明采取

行政手段和高压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陆定一强调:对于学术批评,“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以批判俞平伯为例,指出“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2](506—507页)。陆定一讲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语粗暴,二是无限上纲。这本来就是学术批判的惯常办法,也是伤害这部分被批判的知识分子感情的主要原因。可惜的是,在“反右派斗争”之后的历次学术批判中,这种办法更是变本加厉,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双百”方针提出后,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未能够认真地实行,但历史已经证明,它是一个正确的、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需要认真地加以贯彻的方针。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是对这个方针的最权威的说明,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120页)。这也是陆定一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 二

建国之后,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产生了“左”的错误,从而对长达 20 多年的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曲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张闻天、陈云、任弼时等的积极努力,纠正了共产国际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左”倾错误,逐步建立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保证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但是,在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却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究其原因,薄一波曾经深刻地指出:毛泽东“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的错误认识,可以说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偏见和失误,也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4](1009—1011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理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按其阶级属性来说,绝大多数属于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小部分则属于自由职业者[6]。笔者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根据他们在旧社会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所划定的个人成份,后者则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作出的政治选择[1](29—54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两个问题上长期混淆不清[1](411—423页),成为错误地将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国后将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见端倪。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的决议,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刘少奇在解释这个决议时还特别指出:“注意‘依靠’、‘团结’、‘争取’,这些文字要看清楚。”[7]这就告诉我们,在革命性质转变之际,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仅仅是争取的对象,其政治地位和其他劳动群众显然是不同的。所以,陆定一在建国初期提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正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八个大字[2](421页)。其后,毛泽东提出以世界观为标准,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409页);“反右派斗争”后,又将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在内),全都划到了资产阶级那边[8](484页)。在这个对于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问题上,陆定一和毛泽东保持了一致。他曾说:“文革”之前,他自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是比较“左”的,而“根源在于我接受了按世界观划分阶级的观点,把许多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

1956年1月,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应该说,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是筹备会议的十人小组最终通过了周恩来的意见,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陆定一作为十人小组的成员,却对此持反对态度,因而在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就根本不提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后,随着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

断发展,进而同周恩来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争论。

1962年2至3月,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同时在广州召开科学工作会议和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根据聂荣臻和陶铸的意见以及与会者的强烈要求,在周恩来回京前夕决定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之帽,加上“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3月5日和6日,陈毅分别在两个会议上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与此同时,陈毅还当众批评了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左”倾错误,使得与会者激动不已,向他报以60多次热烈的掌声。不久之后即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又向全国人民郑重宣告: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比起“人民的知识分子”来,这个冕又升了一格),“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10](426页)。

但是,就是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比“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降了一格)的帽子戴在知识分子头上,在当时也是通不过的。薄一波认为:重要的是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意见并不一致,一些人明确反对。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不说话。其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同意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并且批评陈毅:“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你到处讲话要注意。”[4](1006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引发了陆定一与周恩来的当面争论。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央召开宣传文教会议。会上对是否应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争论很大。11月22日,陆定一在会上发表的讲话,是反对派意见的代表。他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点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六〇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sup>①</sup>。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

资产阶级。”[11]

关于陆定一同周恩来的这场争论,薄一波说:“11月26日陆定一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引者按:实际上就是陆定一自己的意见),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周恩来的这番话,可谓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明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却毅然地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其“反潮流”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人所共知,将广大知识分子错误地当成了“资产阶级”,是他们遭受一切苦难的根源。所以,周恩来这奋力的一争,无异是为千百万知识分子请命!薄一波接着说:“小平同志完全支持周总理的意见:‘……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4](1007页)但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支持,陆定一对中央书记处这个“正式决定”根本不予理睬,接着就叫秘书班子给他准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在这个文件中,他除了重申他在中央宣传文教会议上的基本观点以外,还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状况作了以下估计:“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11]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同毛泽东当时对文教系统“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随着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升级,一场主要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革”已经拉开了序幕,因而这个文件也就用不着再搞了。

陆定一同周恩来这场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直到“文革”中还被再次提起。1967年9月,姚文元写

了批判陶铸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送审稿上有这么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9月3日,张春桥请杨成武转告毛泽东:“姚文元批陶的文章中,有一段话批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这个问题涉及总理同陆定一的争论,是否在此文中不提这个问题,请主席考虑。”毛泽东就删去了这段话,并批:“根据春桥同志意见,此段以删去为宜。”[12](402、404页)

陆定一除了在知识分子定性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之外,还在“教育革命”中提出了一系列过火的主张,从而使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深受其害。

“教育革命”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由康生鼓捣起来的。他以党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处叫喊“教育革命”,并宣布教育部以前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一律无效。在“视察”北师大时他说:师大有两个任务:大办工厂,大办学校。每个班都要办一个工厂。从小学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多个学校。在北大,他甚至提出今后教授评级要以其粮食产量为标准。6月,中央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会后,陆定一根据会议的结论写出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581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陆定一宣布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学生即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即学生”,六亿人口“人人能生产,人人能学习”,并且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目标。很明显,这里面有很大的空想主义成分。毛泽东对此文十分赏识,当即指示《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很好,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例如四号或五号,不用新五。”并且亲自修改补充,还为编辑部写了按语。

文章刊出后,毛泽东又专门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13](338、428页)毛泽东对别人的一篇文章评价如此之高,可谓空前绝后。

鼓励知识分子多接触实际(生产劳动当然也是一种实际)虽然没有错,但“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个提法却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它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不算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接着就叫他们到工厂,下农村,大办工厂,大炼钢铁,没完没了地参加与自己的学术专业毫无关系的简单体力劳动。到了“文革”,更提出要他们接受工人和农民的什么“再教育”,有些省市甚至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使他们荒废了专业,在生活上也备受艰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被称作“非劳动者”,因而不断地要他们“参加劳动”和“向劳动人民学习”。这也是他们长期遭受歧视和打击的一个主要原因。据笔者考察,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陈独秀,他认为满足人们衣、食、住、行需要的一切物资都是劳工做成的,而读书人(知识分子)同皇帝、总统、做官的一样,都是坐享其成的人[14](520页)。其后,就有了知识分子“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等等说法,把他们当成了没有什么用处的寄生者。这个问题流毒半个多世纪,直到1977年的5月24日这一天,才由邓小平将其纠正过来。他说:“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15](41页)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分辩,充分表明了这位历史伟人要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的决心。

另外,陆定一在其他有关“教育革命”的言论和著作中谈到教师问题时,也有一些“左”的东西。比如他认为,教师的学术水平有四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根本没有学问的骗子;第二种是有一点学问,但把它夸大了,吹自己的牛皮;第三种是只有书本知识,但不会动手,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的;第四种是又红又专的。”这也未免把新中国的教师水平估计得太低了。在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他还说:“对资产阶级教师斗一下是好的,是必要的,不斗一下,党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2](607页)这话说得并不正确。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的取得,依靠的是自己方针政策正确,而决不是什么“斗”教师。那时,今天说这个是“资产阶级”,明天又说那个是“白旗”,乱斗一气的粗暴做法,显然是极其错误的。陆定一说这些话的时候,和他在解释“双百”方针时竟然判若两人。这时的陆定一,已经坠入了“左”的迷雾。当然,也应该指出,陆定一这段时间在教师培养方面还是提出了不少正确意见的,比如他主张要下苦功读书,提倡招研究生、派留学生,要求在大学一定要学好外语等。

###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定一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同聂荣臻、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对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早在1964年,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次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成了“文革”的导火线。

应该说,对于这篇涉及了1960年以来党的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的文章,陆定一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开始时也是很理解的。他不但当面批评主管《文汇报》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发这篇文章不跟中央打招呼是“不要党的纪律的表现”,而且扣押了戚本禹的批判文章。毛泽东知道后就对江青等人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最高指示”一下达,陆定一也就成了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的“大阎王”。他自己也说:“‘文化大革命’,我第一批被打倒,被关押,罪名是‘阎王殿’。”[2](787页)接着,陆定一由于妻子严慰冰写林彪老婆叶群的匿名信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又被认为是这个事件的“主谋”。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他的“政变经”中大骂陆定一是“王八蛋”,并且指着他大吼:“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康生也大喊:“陆定一是特务!”就这样,陆定一身系累继达13年之久,被折磨得全身都浮肿了。但正是有了这13年的炼狱生活,才使

陆定一在思想上大彻大悟。他说:“我事先从来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自己也会搞起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一九六六年,当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还想,他老人家一定比我正确吧。一九六七年底,对我严刑逼供,我才觉悟到,他是违背党的基本原则,是大错特错了。”[2](816页)正是在认识到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基础上,陆定一对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陆定一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内对知识分子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够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2](780—781页)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这个“自我鉴定”,是认真负责,合乎实际的。

上面已经提到,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最大错误,是他长期反对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定性问题的正确主张。因此,他怀着深深的内疚。他出狱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2](687页)。文中说:由于发动“文革”,“竟使大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崩溃、灭亡的境地。在这乌烟瘴气的时候,周总理像中流砥柱,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一起,挽救中国于危亡。他与人民息息相通,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的“功业说不完,好处说不尽”。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很对的<sup>①</sup>。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以世界观为标准来划分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之所以是错误的,一方面是因为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在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怎么能在40多年前就把它当成划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标准呢?另一方面这个标准的主观随意性太大,也实在不容易掌握。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错误的“大跃进”提了几条不同意见,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予以批斗和罢官。对于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哪些知识分子才算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谁也说不清楚。“反右派斗争”前似乎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算是已经解决了世界观问题,但是“反右派”时竟然也在党员中抓了不少“右派”后,这种看法也被动摇了。因此,按照这个世界观标准,非“无”即“资”,其结果只能是广大知识分子自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事。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标准实际上是要从思想上来划分阶级,因而它不但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背离了毛泽东思想[1](460—461页)。

陆定一进而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的知识分子。他说: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传到中国来的。在土地革命战争那十年间,全国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是知识分子带头建立起来的;上海曾经两三年没有党的组织,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为代表的一批非党的知识分子却坚持在那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俄国的不同,他们很少逃往外国去;相反,许多人却从国外回来为人民政府工作。在“文革”中,所有的知识分子直到小学教师都受到打击和冤屈,但平反之后他们却毫无怨言。陆定一满怀深情地说:“这样好的知识分子,世界上哪里找得到?”[2](821—822页)

陆定一还认为:党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同如何看待农民一样,都是“革命成败之所系”的头等大事。他指出,在1927年革命被迫转入农村的时候,有一个是否看得起农民的问题;在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又有一个是否看得起知识分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解决好,一是因为“农民进城”,二是因为推行“唯成份论”。如果说当年知识分子同农民的结合曾经是困难的,那么农民干部要学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知识分子结合也是困难的。加之在干部问题上推行“唯成份论”,不信任知识分子,这就造成了长期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2](821—823页)。陆定一的意思是说:过去我们是依靠农民夺取了

政权,在胜利后就应该依靠知识分子来建设国家。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深刻反思。我们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但是并不能仅依靠农民来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6](116页)。农民既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农民的最高理想是“均贫富”,在生产水平低下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就只好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即让大家都受穷。1958年被誉之为“五亿农民的伟大创造”的“人民公社”,不但从它的背后看到了汉末张鲁“五斗米道”的影子,而且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现代版<sup>①</sup>,实行的后果如何,大家都是知道的。而正如江泽民所深刻指出的,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又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18]。试想,如果我们在建国后就及时地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我国的“四化”伟业早就胜利实现了。

关于“教育革命”,陆定一说:当时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口号还是对的。我们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实行这种结合。只是因为提的时间不恰当,办法不对,结果“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读书,上山去找铁、找煤、挖红薯……,实际上把教育搞乱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大的责任”[2](700页)。在这场“革命”中,除了上引陆定一说的“斗资产阶级教师”以外,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教师也逃不脱被批的命运,从而又一次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感情。此外,当时还推行了很多荒唐的做法,如为了“破除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迷信”,号召学生撇开他们自己编教材,甚至要低年级的学生编高级的教材等。尤其严重的是,这场“革命”“实际上把教育搞乱了”。它把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能够正确反映教育的客观规律的许多规章制度和教学方法也给搞掉了。至于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我国大学的工农医等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本来就有行之有效的实习和见习制度,因而它们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决不是从1958年才开始的。所以,这场“教育革命”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教育战线仍在进

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有计划地恢复过去被“教育革命”搞掉的那些老办法,并进而与国际惯例接轨罢了。

当前,全党正在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忠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说,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深刻反思,充分地证明了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文过,不饰非,襟怀坦白,无私无畏。他曾经沉痛地说:“毛泽东的错误,党中央专门作了一个决议。我陆定一的错误没有人说,我只好自己骂自己。我的错误也很大。”[17]反思自己的错误时能够达到“自己骂自己”的境界,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陆定一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跳动着的一颗赤子之心。陆定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是高水平的。建国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达20多年的“左”的

错误的折腾,促使陆定一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人们常说某某人是“事后诸葛亮”,似乎带有贬意。笔者却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对任何真理的认识都只能是“事后诸葛亮”。有些人虽然身居高位之所以一辈子也当不了这个“事后诸葛亮”,一是因为他们的私心太重,对自己的错误死不认账,不愿也不敢面对现实;二是因为他们的水平太低,根本没有当这个“事后诸葛亮”的资格。

陆定一晚年曾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行为,写自己的历史,都在经受历史的考验。”[2](832页)这话说得实在好极了!历史,只有历史,才是最权威、最公正的审判者。陆定一晚年对建国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像一曲嘹亮的黄昏颂,使我们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愧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注释:

- ①陈云的秘书刘家栋在《陈云在延安》一书中说,这个决定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起草的。大概由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所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见第2卷)。
- ②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当晚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
- ③胡风曾经是一个被国民党严密监视、重点打击的左翼人士。建国后胡风等人由于对党的文艺政策持有不同意见,向中央提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因而被定为“胡风文艺宗派集团”,受到了公开批判,后来毛泽东将其改为“胡风反党集团”并决定逮捕法办。由于在胡风家中抄出了阿陇给他的所谓“反革命密信”,又被毛泽东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但周恩来、廖梦醒和张执一等都证明,阿陇是我方的情报人员,那些信是他用反话经由胡风给我方送的情报。当时负责此案的王康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错案,要求进一步讨论。但周扬和罗瑞卿等人却说:“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王康还认为,陆定一作为“肃反”时中央五人小组(后为十人小组)的组长,对此案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见王康:《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载《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 ④胡乔木在谈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胡绳也说:当时对俞平伯“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同时,“党对这种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
- ⑤1956年7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匈共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由格罗接替。但格罗上台后继续采取高压手段,终于引发了10月23日的“匈牙利事件”,导致苏联出兵镇压。
- ⑥这里说的“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指1958年12月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指1960年3月教育部门的一个文件,其中规定: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右派更不能提升。
- ⑦周恩来说的是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了,而不是说他们的“政治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为谁服务”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不但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也易于操作,应该予以历史的肯定。但是从理论上讲,它并不是很准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服务(工作)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我们既然不能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过的工人称为“资产阶级工人”,当然也就不应该将这样的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⑧《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及裴松之注引《典略》载: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行“五斗米道”,“置义舍”,“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周礼》军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将农村基层组织定为“两”(二十五户)。“两”既是公有制经济单位,又执行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和司法行政的职能。每“两”设“两司马”一人进行全面管理,并设国库和礼拜堂。在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基础上,每家的收成除留足口粮外,一律上缴国库。婚娶弥月喜事及鳏寡孤独废疾,由国库按规定进行补助。在礼拜堂中,由“两司马”领导学习《圣经》及“天王诏书”。另外还实行类似民兵的制度,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杀敌捕贼,无事耕田。如此等等。

#### 参考文献:

- [1]朱文显. 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2]陆定一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6]朱文显. 广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 [7]刘少奇. 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J]. 党的文献,1993,(5).
- [8]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9]参见:陈清泉. 光辉的业绩,高尚的情操[J]. 人物,1996,(6).
- [1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1]参见:龚育之.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J]. 百年潮,1999,(1).
-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参见:于光远. 陆定一印象[J]. 党史博览,2000,(10).
- [18]江泽民.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1992-10-21.

## Lu Dingyi and the Party's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ZHU Wen-xian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SN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 Thought, Lu Dingyi mak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Party's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However, Lu commits "Left" errors with respect to intellectual issue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 R. C. and therefore must answer for the complications in intellectual issues involving the Party in up to 20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 P. C., Lu re-thinks profoundly the Party's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 R. C.

**Key words:** Lu Dingy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责任编辑:李大明]